

2014年大英博物館國際會議報告

明：宮廷與交流（1400-1450）^{*}

戰蓓蓓^{**}

2014年9月18日至2015年1月5日之間，一場精心籌備的明代專展在大英博物館新開側廳中進行。這場名為「明：皇朝盛事五十年」¹的展覽是由牛津大學藝術史系教授柯律格（Craig Clunas）、大英博物館中國瓷器部負責人霍吉淑（Jessica Harrison-Hall）共同籌辦的。展覽分為「宮廷：宮殿，人與物品」（court: palaces, people and objects）、「武：戰爭的藝術」（wu: arts of war）、「文：和平的藝術」（wen: arts of peace）、「信仰：奇跡與救贖」（beliefs: miracles and salvation）、「商業：世界中的明朝」（commerce: the Ming in the world）五部分。展品來自世界各地，包括一些新近的考古發現以及私人收藏，展現了明代於十六世紀上半葉這五十年間多樣的文化，以及中央政府與地方乃至外界各國之往來互動。2014年10月9日至11日召開的「明：宮廷與交流（1400-1450）」國際研討會亦圍繞此主題進行探討，共有三十多位學者受邀報告，會議論文將在2015年彙集成冊，由大英博物館出版社發行。

會議總共有九個討論組，每組三到四位報告人，每人有20分鐘的報告時間。10月9日下午1時起，報告人及聽眾便能登記入場，可容納300餘人的演講廳幾乎座無虛席。在1時30分柯律格教授致歡迎詞後，便開始第一個議題：「城市與建築」，由大英博物館亞洲部主任施美茵（Jan Stuart）教授擔

* Ming: Courts and Contacts 1400-1450.

** Ph.D. Student,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¹ 取大英博物館官方網站翻譯，英文題目為“Ming: Fifty Years that Changed China”。由於會議的特殊安排，論文摘要與文章均暫未公開。本報告乃基於筆者現場記錄，或見零碎紕漏之處，為筆者之失誤，在此致歉。

任主持人。第一位報告人為紐約大學美術史研究所喬迅 (Jonathan Hay) 教授，其議題為「綠色北京：新都城的生態」。喬迅教授簡略回顧了元代大都之狀況，以及燕王朱棣 (即明成祖，1360-1424，1403-1424 在位) 奪嫡後遷都北京之歷史。他對都市建設提出了一個「勢」的概念，這個概念被與山勢、棋勢甚至戰勢作對照，定義為「運動之結構」 (structure of movement)。他的討論以在城市中非生命體 (例如水和統治合法性) 的運作以及生命體 (例如樹木與大象) 的命運為線索。他希望從城市的不同方面提供解讀其運作的框架，來呈現作為明代新都的北京城中，人類活動與非人類世界的互動關係。

第二位報告人是倫敦大學亞非學院藝術史與考古系的翁純全 (Clarence Eng) 教授。他的報告主題為南京城外的大報恩寺塔，該塔建於永樂至宣德年間，通體琉璃，毀於太平天國的「天京事變」中。關於大報恩寺之文字記載有僧人與官方兩條不同的傳承，對於該塔之記載頗有出入。翁教授集合了塔之原址和燒製琉璃件之舊窯的出土品，以及收藏於世界各地博物館的原塔組件和修葺備件，討論了塔之形制、建造及建置原因等問題，並指出這些琉璃組件中可觀察到的外來神獸之形象與造型，證明該塔的設計實吸收了許多外來元素。

來自波士頓學院藝術系的 Aurelia Campbell 教授是本討論組最後一位報告人，她的題目是「追蹤明初宮廷建築 (風格) 在邊疆之延續」。她比較了 1416 年修建的明長陵陵恩殿、1412 年興建之武當山紫霄殿，以及建於 1427 年的青海瞿曇寺隆國殿。通過對三座建築中基本模數的分析與對比，²她認為明初大型建築中的形式呈現出高度的標準化，可體現出其從宋代《營造法式》至清代《工部工程做法》之轉折與傳承，而這種標準化模式在十五世紀初便在比較廣闊的地理疆域上產生影響，儘管這些建築在外部裝飾上或呈現出當地風格，但實際建築構造卻是一致的。

第二個討論組的議題為「宮廷與物品」，主持人為倫敦大學亞非學院藝術史與考古系畢宗陶 (Stacy Pierson) 教授。本組第一位報告人，就是籌辦此次

² 基本模數乃建築尺寸的基本單位，在宋代《營造法式》中為「材」，在清代《工部工程做法》中為「斗口」。Aurelia 報告的重點，便是強調產生這三座建築的明初，應是在形式上由前書體系演變成後書的轉折時期。

會議的柯律格教授，其題目為「寶石與明代文化，1400-1450」。他主要的研究對象，為湖北梁莊王（1411-1441）墓出土的一批金鑲寶石飾品及多枚裸石。這些寶石的原產地應為東南亞，其中以紅寶石為主，藍寶石次之。據柯律格教授推測，紅寶石的來源最可能是斯里蘭卡。此外，柯教授認為，紅寶石與黃金乃歐亞大陸皇室貴族普遍用來標榜身分地位之配飾，而黃金鑲紅寶石飾品亦為十四至十五世紀歐亞大陸皇室之間互相餽贈之禮品，故在梁莊王墓中發現的此類出土物，或可作為明初承襲蒙元時尚的一個例證也可能反映了歐亞大陸與明廷之間的接觸與交流。

接下來是此次會議另一位籌辦人霍吉淑教授關於「明初宮廷用瓷」的報告，她主要針對這段時期青花瓷的地位提出了新觀點。在十五世紀的歐洲，青花瓷被認為適合作為供奉神之器物；到了十七世紀，青花瓷已不再被視為珍寶，而是中產階級即可接觸到的奢侈品。因此在十五至十七世紀，青花瓷在歐洲地位已逐漸下降。相對地，霍教授認為在世界的另一邊，十五世紀明代宮廷內的青花瓷或許亦非專供皇帝使用。她從瓷器款式的分析、與其他材質器皿用途的比較，以及明代青花瓷器固有用途的論述三方面入手，推測出明初青花瓷對外雖為高級商品，但在國內，民間也會生產不那麼精緻的次級品，而由官窯燒造、專供宮廷使用的青花瓷器皿，亦多用作裝飾及花盆、瓷凳等家用用途，並未發現以青花瓷為皇帝特製私人專用之物。

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尹翠琪（Maggie Chui Ki Wan）教授的報告，則以真武玄天上帝身邊雷部諸神的祭祀為著眼點，探討明初道教祭祀之神與道教書籍印刷之間的關係。她提出雷部諸神像並未出現在早期明廷於武當山的敕製之列，直至十四世紀經由一些道教書籍的印刷，才使雷部諸神逐漸受到重視。例如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1368-1398 在位）第十七子寧王朱權（1378-1448）在《天皇至道太清玉冊》中明確指出「真武兩旁，當塑雷部諸神」，此後1473年皇家在武當安奉神像中，即有雷神在內。

9 日的最後一場報告，是大英博物館東亞錢幣館汪海嵐（Helen Wang）館長與文物保護和科學研究部門 Caroline Cartwright 教授關於明代紙幣材質成分分析的合作研究。汪館長首先介紹了中國古代紙幣的使用概況，以及明代紙幣的一些特徵，包括尺幅比較大、印刷質量一般、與金代紙幣類似等等。

接著 Cartwright 教授分享了一些使用電子顯微鏡觀察明代紙幣樣本的研究成果。為了分析紙幣材質，他們從大英博物館藏明代紙幣樣品的邊緣截取了微量樣本，與已知中國及日本常見的紙幣材質樣本對照。分析之後發現，明代紙幣的材質是由桑、稻草、竹等多種植物纖維混合而成。此一研究成果的詳細內容將發表在大英博物館《科技研究學報》(Technical Research Bulletin) 12 月出刊的第 8 輯。

10 日的議程，由討論組「宮廷與人物」揭開序幕，主持人為獨立研究學者 Regina Krahl。第一位報告人為密西根大學音樂系林萃青 (Joseph Lam) 教授，主要討論明初寧王朱權在音樂方面的貢獻與影響。這位親王早年曾活躍於政治、軍事舞臺，然而 1403 年之後，將注意力轉向文化領域，廣泛參與宗教及藝術活動。他所編寫的四部戲曲，其創作動機均帶有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而非以娛樂為目的，例如其中一部關於司馬相如 (約 179BC-117BC) 的戲曲，便歌頌及宣揚了女性對男性無私奉獻等傳統倫理道德。林教授認為朱權之所以能對明初音樂的發展有所貢獻，除得益於其個人，亦源自他早年所受到藝術教育及廣泛社會關係等因素的綜合影響，戲曲創作對朱權而言不但是一種修養的展現，也是一種公共管理的手段。

第二位報告的是大英博物館的項目研究員陸於平教授，她的題目為「皇后的龍冠：明初皇權象徵」。一般認為皇后的冠服以鳳為主要特徵，但陸教授利用圖片、實物以及文字資料進行分析，認為情況並非如此。如根據《大明會典》關於后妃的條例，可知龍的圖案是皇后的專利，妃嬪只能在冠服上使用鸞鳳或翟的圖案，因此陸教授認為，龍鳳之組合或為皇后區別於其他嬪妃之象徵，而以這樣的角度去解讀一些傳世宮廷器物，或能得出不同之結論。另外，她亦對明初皇后冠帽和宋元時期冠帽作出初步比較，如史家在描述明仁宗 (1378-1425, 1424-1425 在位) 之張皇后 (1379-1442) 時強調其擁有深刻的政治知識，便是一例。

牛津大學東方學院戴彼得 (Peter Ditmanson) 教授的演講題目與議程上略有出入，現場改成「永樂朝官員與其合法性之塑造」，主要探討楊士奇 (1364-1444) 的個人回憶錄《三朝聖諭錄》對明成祖形象的塑造及影響。因關於永樂朝政事的歷史記載如《明實錄》等，在很長的一段時期內都只流通於宮廷

內部。而楊士奇在其個人回憶錄中，將成祖描繪成憂國憂民之賢君的形象，這些記載又被後世廣泛引用，進而產生了深遠之影響。

第四個討論組議題是「宮廷與繪畫」，由倫敦大學亞非學院藝術史與考古系馬嘯鴻（Shane McCausland）教授擔任主持人。第一位報告人為中國中央美術學院尹吉男教授，他從鎮江博物館和美國大都會博物館所藏兩版〈杏園雅集圖〉談起，討論兩版畫作之共同模式所反映的藝術史、政治史與人物畫史意義。他通過考察江西文官群體對浙江畫家的推薦，以及後者作品中呈現的前者活動，來分析兩個群體之間的互動關係，重點探詢了杏園雅集活動本身所具有的政治性，以及在文官與畫家互動過程中逐漸淡化的地域色彩。

緊接著是北京故宮博物院余輝教授的報告，題目為「王宮圖與蒯祥」。蒯祥（1398-1481）為明初蘇州香山幫木工之首領，亦是成祖興建北京宮殿時的重要設計師。余教授從比較兩岸故宮所藏〈王宮圖〉的幾個不同版本入手，探討宮廷與民間畫師對此題材的不同演繹，又根據畫中有無迎魂、招魂儀式來推測這幾個版本的時間順序。另外他認為，這一系列〈王宮圖〉在王宮建築群之前畫上人物全身肖像的構圖，可能就是明後期〈官員上朝圖〉構圖模式的鼻祖。

魯賓藝術博物館杜凱鶴（Karl Debreczeny）教授的報告題目為「明初藏區的帝國工作室」。其重點放在由明代宮廷工匠參與建造的青海瞿曇寺，尤其是該寺在明初所經歷的三個建設階段，即 1392 年所成之瞿曇寺殿、1418 年建成之寶光殿以及 1427 年建成之隆國殿。明代工匠曾根據瞿曇寺殿的造型特色進行調整，並據此製造出具有一定地方色彩之藝術品，存放於殿中；寶光殿的菩薩像有永樂年落款，顯示應為皇家造辦機構所製，再送至瞿曇寺；而隆國殿在供奉皇帝萬歲牌的同時，卻未反映多少藏區的藝術風格（相較之下，清朝重修隆國殿時，才在建築風格上呈現較多藏區特點）。透過以上幾點分析，杜教授認為明初瞿曇寺雖地處邊區，但基本上是明朝皇權之產物與象徵。

第五個討論組聚焦於對「信仰」議題的探討，由牛津大學的 Jessica Rawson 教授擔任主持人。堪薩斯大學的 Marsha Haufler 教授是第一位報告人，題目為「明代僧人肖像」，以姚廣孝（1335-1418）身披袈裟之肖像細節切入，認為從畫中主角頭上並未有象徵超自然力量的光暈，到他所坐之世俗化

寶座，以及對其俗家名號、爵位的標註，都可以看出這幅貌似僧人裝扮的肖像中，存有刻意彰顯姚廣孝政治成就的元素。而通過對釋迦也失（1354-1439）的兩幅唐卡，則可看出藏區視覺文化對明代京城的影響。例如其中一幅唐卡的拱門造型，便與南京大報恩寺塔的拱門有一定程度的可相似性；而在另一幅唐卡中，釋迦也先盤腿坐在一張與姚廣孝肖像畫中相似的寶座上，寶座的扶手更有王侯所用之龍頭裝飾，旁邊几案上還陳列著來自皇帝的禮物，其中甚至包括皇室禮儀中常用到的香爐。綜上所述，姚廣孝像可謂政治權力滲透到僧人肖像之例，釋迦也失之唐卡則可視為中原與藏區交流之下形成的一種視覺符號集合，其針對之受眾群便是藏區的人民。

臺北故宮博物院的林莉娜教授提出，明成祖為了表明自己統治的合法性，四處搜尋祥瑞之應兆，並據此進行相關製作。如繪畫方面有以騶虞為題材的幾幅作品，其他如麒麟、白象等祥瑞動物亦在詩畫作品中有所呈現，詩歌有〈聖德瑞應頌〉以及一些描述外國進獻之珍奇異獸的臺閣體詩歌，宗教方面先有姚廣孝塑造真武助燕王的神話，後有成祖御製的《大明玄天上帝瑞應圖錄》。而為配合遷都所作的《北京八景圖》，更為永樂朝製造出一副太平盛世之狀貌。

湖北省博物館院文清研究員的報告，主要介紹了湖北省境內豐富的文化資源，尤其是目前已出土的一批明代宗室墓，院研究員提到，湖北省共有十三個藩王宗系，並重點介紹了楚昭王（1364-1424）、湘獻王（1371-1399）、遼簡王（1377-1424）、郢靖王（1388-1414）及梁莊王之陵園、墓室以及文物。湖北省境內藩王墓的陪葬文物，往往同時包含了道教、佛教、藏傳佛教等不同宗教的器物，顯示出明代宗室於信仰上的多樣和融合。

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的施靜菲教授提出，明初開始生產的瓷製禮器，不但有別於《宣和博古圖》與《三禮圖》所錄禮器所反映的兩大禮儀系統，亦將瓷製品的地位提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這個變化既推進了明代官窯的建立，又是乾隆時期（1735-1795）第三個禮儀系統產生的前提條件。此外，明初的禮器也有混合此前兩大禮儀系統特點而形成的創新元素，為乾隆朝禮器之變化埋下了伏筆。

10 日最後一個討論組，是由華威大學歷史系的何安娜（Anne Gerritsen）教

授主持的「軍事與統治」。科爾蓋德大學的魯大維 (David Robinson) 的研究，將關注的區域從明帝國擴展到整個歐亞大陸。朱元璋建立明朝時，需要對抗蒙古帝國所遺留的印象，進而針對存在至 1388 年的北元政府製造出一套理論：宋失德而亡天下於元，元失德繼而亡天下於明，明太祖朱元璋奉天承命而得天下。十五世紀初，阿魯臺 (?-1434) 兩次與明廷作戰，明廷便有詩作稱「胡運永終，有此遺孽」；而在《明實錄》關於成祖親征漠北之記載中，亦將明代一統天下與蒙元僅有殘餘勢力留存北方之狀況進行對比。另一方面，明代皇室卻也利用了成吉思汗 (1162-1227) 所遺留的武力魅力，如明宣宗 (1399-1435, 1425-1435 在位) 在〈宣宗射獵圖〉中頭戴蒙古帽，而其「御筆戲作」之〈雙犬圖〉描繪的亦是宮廷馴養、原產自中東的獵犬。因此他認為，明初政府並未將其政權之權威視作理所當然，而是積極採用著各種方式來消除或減弱前代的印記，以及彰顯己方的政治權威。

南密西西比大學歷史系的 Kenneth Swope 教授，則重新審視了十五世紀初明成祖違背太祖減少征戰的戰略，而對毗鄰區域進行的征討。傳統觀點通常將這些征戰歸結為成祖追求個人軍事成就來建立其統治合法性，但 Swope 教授力圖以征討安南為例，來說明明代的整體政治情況，特別是對周邊地區立威，亦是成祖討伐鄰國的重要目的。

紐約市立大學柏魯克分校歷史系的沈丹森 (Tansen Sen) 教授認為，目前對中國與南亞關係的研究大多是基於中文材料，以鄭和 (1371-1433) 下西洋為例，中文資料對鄭和艦隊與途經地區之土著所發生的衝突往往加以粉飾，將對方描述成不道德、腐敗的蠻夷之輩，然而通過對當地歷史文獻的研讀，便得知這些衝突背後，又隱藏著複雜的政治、宗教甚至商業因素，而鄭和下西洋本身，更是明成祖擴展其對天下之影響與控制的行為。

11 日上午的第一個討論組亦延續了前一日的話題，將目光擴至「明代海事」，由來自德蒙福特大學人文藝術學院的 Elizabeth Lambourn 教授主持。第一位報告人為澳洲國立大學亞太學院的韋傑夫 (Geoffrey Wade) 教授，他先追溯了明初政府在雲南之征戰，繼而分析其在海上派出的以鄭和為代表的宦官團體，指出這群宦官在回朝後所受賞賜與武臣相仿，並認為鄭和在爪哇等國與當地人之糾紛亦有早期殖民主義的特徵。而鄭和在斯里蘭卡等地佈施之

碑刻，亦是明朝在海外樹立的帝國影響之符號。因此他認為明朝對其毗鄰地區有四種控制方式：即直接或間接的殖民、宣佈海上霸權，以及宗主權。

劍橋大學 Wolfson 學院的程思麗 (Sally Church) 教授，探討了關於鄭和艦隊的一些細節資訊，認為這些資訊在史料中存在著許多可疑甚至矛盾之處。例如據在鄭和艦隊中之大者，長 44 丈、寬 18 丈，換算成現代度量衡約為 137 公尺長、56 公尺寬，若與二十世紀初美國明尼蘇達號戰艦 (長 139 公尺，但寬度僅 24 公尺) 相比，明尼蘇達戰艦長寬比為 5.8，而鄭和艦隊中的大型艦僅為 2.45，似乎不太合理。此一比較雖不能做為下定論的依據，卻已足以令人反思相關史料之可信度。畢竟，隨著成化年間下西洋活動的終止，官方的相關材料亦被毀去，今人僅能參考目前殘存的零星史料，如《三寶太監下西洋》等小說、筆記、《明史》、《明實錄》、民間稗史中的片段，以及時人行紀和鄭和在南京靜海寺所立的殘碑等。況且南京現存造船廠中留下的凹陷地形寬度，也與前述尺寸不符，各種史料對鄭和艦隊載重方面資訊的記載亦有自相矛盾之處。而從艦隊所需木料的角度出發，下西洋活動牽扯到的砍伐、交通、人工等方面，所消耗的金錢物資數量更是巨大，因此鄭和艦隊的細節資訊，需要進行更多對文字、考古以及其他資料的多方考證與互相參詳。

北京故宮博物院趙中男教授對下西洋活動的討論，則將關注點放在其停止的原因。他將明廷下西洋活動分為五個階段：永樂十九年 (1421) 暫停、仁宗宣佈終止、宣宗朝 (1426-1435) 第七次下西洋、正統、景泰至天順年間 (1436-1464) 無暇顧及、成化年間徹底終止。趙中男認為成化年間主張終止下西洋活動的官員，除了憂國憂民，或亦有為自身利益考慮之因素。此前明廷曾用下西洋帶回香料充作官員俸祿，而這些香料既無法大量使用，出售亦有困難，使官員生活陷入窘迫之境，成化年間官員極力反對下西洋，亦或有考慮到此一先例之緣故。

北京大學的秦大樹教授，又將討論的疆域廣拓至北非。他報告的題目是「肯亞發現的明代瓷器」，主要介紹北京大學與肯亞國立博物館合作的考古發掘計畫，目前總共在當地發掘與搜集了 9552 片瓷器碎片，復原了 1060 件瓷器。通過對碎片與瓷器的分類整理與研究，發現最早可以追溯至九世紀的長沙窯。秦教授認為這些考古發現具有眾多意義，例如挑戰了目前學界認知

中瓷器輸出的「明代缺口」(Ming Gap)，即 1325-1380 年間整體的瓷器出口短缺，以及 1352-1487 年間的青花瓷出口短缺。他認為僅從沉船打撈結果，是不足以判斷瓷器出口狀況的，而從陸地上的發掘與搜集來看，所謂「明代缺口」其實並不存在。

接下來的「共通的文化模型」討論組，是由大英博物館的 Timothy Clark 教授主持。第一位報告者是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歷史系的施姍姍 (Sarah Schneewind) 教授，她以明宣宗御編、詳述五倫理法的《五倫書》為研究對象，透過與朝鮮李朝一本相關書籍作比較，指出兩者在相似的倫理框架下，卻於具體理法方面存在不同的詮釋。

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的李秀美 (Lee Soomi) 教授認為，李朝以對明朝文化的學習與交流，取代了前朝重佛教的文化傳統，樹立了自身的文化權威。李朝太祖 (1335-1408, 1392-1398 在位) 於 1392 年廢黜高麗王王瑤 (1345-1394, 1389-1392 在位) 取而代之，將都城從開京遷至漢陽，並在文化上積極向明朝靠攏。在十五世紀中葉，李朝學者已經可以與明代學者進行對詩一類的文化交流，李教授指出，此種交流並無特別政治意圖，而更傾向於李朝學者文化修養的一種展示，彰顯本朝穩定的文化權威。

哈佛大學藝術與建築史系的 Yukio Lippit 教授因故未能出席，由主持人代為宣讀其論文。該文主要透過研究對日本室町時代畫家雪舟 (1420-1506) 的研究，指出室町畫派宣稱其畫風遵從南宋之說的問題。Lippit 教授認為，雪舟於 1467-1469 年間跟隨商船到中國旅行，使得他有機會深入當時中國的風土人情，並且在北京畫院學習，進而使他的作品在該段時期有所轉型，儘管他聲稱自己承襲的是南宋梁楷等人之畫風，但經此旅行後，其作品呈現的風格，明顯受到中國浙派宮廷風格之影響。

最後一個討論組是大英博物館 Ladan Akbarnia 教授主持的「跨文化交流」。來自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的卜正民教授 (Timothy James Brook) 是第一位報告人，其題目為「明初交通」。他參考了牛津大學博多利圖書館所藏海道針經《順風相送》以及東西洋航海圖 (Selden Map)，指出兩者所記路途略有差異，各地之間行程更數也有偏差，可見航海知識在當時並沒有統一，僅僅作為參考用途。而在 1626 年前後，來自歐洲的旅行者逐漸改變了這種

狀況，由於商業利益正是促成此一改變的動因，遂使當時的東西交通網絡中，出現朝貢、私營貿易並存的現象。

同樣來自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的 Carla Nappi 教授，則分享了她對永樂時期所設立、用以接待外來使者並培養專門翻譯的機構——四夷館的研究。館內的翻譯來自不同的家庭背景，有些家庭世代選拔人才至四夷館，亦有富家子弟利用捐納管道進入四夷館，以之作為轉入其他機構的跳板。四夷館所培養的翻譯不僅限於筆譯，亦有口譯，而這些翻譯也可能被送至邊疆，傳授使者語言及禮儀，甚至在某種程度上照顧使者之日常生活。教學方面，四夷館從各種外語的字母系統開始教授，還會編寫歌訣以幫助學員記憶，亦有相應的考試機制。不同語種所使用的詞彙表分類大抵相仿，而詞彙則略有差異。Nappi 教授認為，這些詞彙表建立了漢語詞彙和不同語種中語義微有差異的相應詞彙之間的關聯，因此產生了新的同義詞，對語義發展本身產生了深遠之影響。

紐約大學的 Priscilla Soucek 教授報告的題目是「觀望東西：帖木兒帝國與明的藝術聯繫」。創建於 1370 年的帖木兒帝國以後蒙古帝國自居，並以今撒馬爾罕為中心佔領了眾多鄰國土地，各地建築工匠亦被視作一種財產，在其領土內跟隨移動。而從帖木兒帝國的建築藝術上來看，其建築表面常見蓮花圖案，瓷器上亦有龍形圖案，可見對當時遠東的藝術形態有高度的興趣，進而予以模仿。從帖木兒帝國存世之《國王書》中的插圖可以看到，三位明朝使者在帖木兒朝廷中覲見，圖中亦繪有不少瓷器。然後從畫中的一些元素（如明朝使者站在圖中較靠後的位置）來看，帖木兒（1336-1405，1370-1405 在位）並不尊重明朝使者。帖木兒曾扣押了明朝使臣，直到帖木兒的兒子（沙哈魯，1377-1447，1405-1447 在位）登基、與明朝重修舊好後，這些使者方被釋放。但在此之外，中國在伊朗人的想像世界中亦是相當浪漫的，例如在當地繪畫中，中國女性都被描繪得非常美麗，中國的植物亦是浪漫的象徵。

牛津大學的 John Darwin 教授站在「帝國」的角度，對整個會議發表了總結性評論。他提出兩個思考框架：其一是全球史的結構，即世界各個國家地區之間的聯繫、不聯繫或者不均衡的聯繫；其二是重新反思作為文化個體的國家概念，從全球史角度進行的討論分析，又是否挑戰了這個概念。他提

出需要特別注意文化交流互動造成的國家概念的不穩定性。相應的，帝國對於人員、貨物以及觀念的流動性加以控制，是維持其穩定性的一種手法。

柯律格教授的總結，則強調權力的基礎在於合作，無論是政治合法性、文化優越性、物質、資訊控制等方面，都有不同的政治社會個體出於自身需求而進行合作。此類合作產生了各種互相重疊的網絡，而這些網絡又為中央政治所控制。此次研討會，與會學者對明初的社會權力結構和文化脈絡作出不同的解讀，柯教授希望能藉此引發學界更多對此時期的討論與研究。

以筆者作為聽眾的角度來看，本次會議因其組織方式，更像是一場多人合作完成的大型講座，用以詮釋及挖掘展覽中各項展品所呈現 1400-1450 年間明代內外的發展狀況。這場或為英文世界最大規模的明代專題會議，對筆者而言，最特別之處在於從一個相對短的時期出發，結合不同面向的分析，來推進歷史研究的廣度與深度。首先，在研究方法上，新材料的使用，以及基於不同類型、不同來源的材料所採用的分析手法，例如考古發現的整合與研究、對圖像圖形的視覺分析、跨語言文本的對照，都豐富了此前從傳統史料中對此時代的解讀。其次，在研究範圍方面，也充滿了地理上的層次感，除了在明帝國內部關注中心與地區的問題，又將視角拓展至整個歐亞大陸及貿易航線的跨地域網絡，為此一時期的相關研究提供了更廣闊的思考空間，亦加深了對此空間中所存在網絡結構的理解。誠然，本次會議上所發表的成果，開拓了對此五十年歷史研究的廣度，但筆者認為其意義不僅於此，亦在於由五十年的主題出發，集中呈現出不同材料、方法、思路的碰撞與對話，其貢獻當不局限於 1400-1450 年這五十年研究的範圍。